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4.05.019

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赵海滨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关键词] 中国民意;中日关系;反日“入常”;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14)05-0087-05

中日关系一直以来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据笔者观察,以往的研究大多比较关注中国有关外事部门对日政策的分析,对中国民意之于中日关系影响和作用的研究则更显薄弱。本文试图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详尽分析并阐释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就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工作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民意和民意互动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各国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与观察视角对民意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丰富和深化人们对民意认识的同时,也使得民意概念模糊不清、歧义丛生。奥尔波(Floyd H. Allport)认为,民意是个人可随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被要求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赞成或反对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特定状况、人、计划等,并表现出人数、强度和稳定性的比率。^[1]韩念西(Bernard C. Hennessy)认为:“民意是一定数量的人对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务所表达的偏好的综合。”^[2]伯瑞斯(Lord Bryce)认为:“民意是各种矛盾的见解、幻想、信仰、偏见,以及愿望的集合体。”^[3]喻国明认为:“民意,又称民心、公意,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物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

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4]吴顺长认为:“民意不单单是人民范畴中某个群体或某个个体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愿望,而是人民这个集合体的意向趋势,它所反映的总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5]

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于民意的概念界定主要着眼于民意的结构,即主体、客体与内容。学者们眼中的民意主体可以分为四类:(1)人民、人们或民众;(2)大多数公民、国民或成员;(3)一群特定的人,既可以是多数人,也可以是少数人;(4)个人或私人。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十分关注民意客体的重要性,如,奥尔波,而国内学者则侧重民意主体的公共性,如喻国明等。从民意的内容看,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1)民意是共识;(2)民意是一种集合体或综合。

综合以上各种定义,结合本文研究目标,笔者认为,“民意”是指作为非统治群体的一般民众对中外关系中的某一事件所秉持的情绪、偏好、意见和愿望的综合。可以对这一定义做如下解读:其一,民意是一般民众的意见和看法。“一般民众”既可以指多数人,也可以指少数人。民意未必都是多数人的意志,由于少数人也是“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想法和

[收稿日期]2014-07-15

[作者简介]赵海滨(1970—),男,山东滨州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国际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愿望当然也是民意,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民意。其二,民意指向的对象是中外关系中的某一具体事件。其三,民意是情绪、偏好、意见和愿望的综合。民意不一定是排除歧见的相近或同质的情感和意志。对于某一具体事件,民众往往既可能会形成某种共识,也可能存在意见分歧。所以,民意应该是同质与异质、共识与歧见的统一或集合体。

显然,“民意”作为一般民众所秉持的情绪、偏好、意见和愿望的综合,并不会自动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力,而必须通过与本国政府以及外国政府和民众产生互动,才能最终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民意发挥作用的这一方式可称之为“民意互动”。笔者认为,“民意互动”对于民意影响中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民意互动”是使“民意”产生作用的必经阶段。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国反战民意表现非常突出,但并不能改变政府政策,并没有促使政府尽早结束战争。^[6]因为反战民意没有与政府外交形成互动,因而也就无法影响越南战争的进程。

其次,“民意互动”能够使我们抓住重点,即选取和重视那些产生互动的“民意”加以研究。事实上,所谓“真实”的民意未必都能够进入“互动”的过程,而能够影响中外关系的只能是那些进入互动过程的“民意”。这部分民意之所以进入互动过程,是因为其意愿表达或者暗合了政府的意图和主张,或者其表现手段有违常规而进入了政府的视野。

二、反日“入常”事件中的民意作用分析

(一)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笔者认为应该首先确立一组指标体系作为检验方式和衡量标准:(1)观察中国民意诉求是否与当时中日关系的变化结果相吻合。(2)观察民意互动是否对本国政府产生影响。(3)观察民意互动是否对他国政府及其民众产生影响。

为进行上述研究,笔者在此采用公开的材料作为观察和分析的依据,尤其对政府领导人讲话、政府发言人讲话给予更多关注。这既是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也是因为政府官员言论较具权威性和可信度,其对中国民意的评述更能反映出中国民意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和作用。本文选取2005年中国民众反日“入常”事件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一是因为该事件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二是因为中国民众对该事件的参与,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具有某些代表性和标本意义。

(二)反日“入常”民意表达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恶化

中日关系的政策措施,致使两国关系迅速跌入冰点。2005年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外交举动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从2005年3月起,中国民众开始利用互联网表达反日情绪,并积极组织发动示威游行。2005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还结合民众的反应对日方申请“入常”发表了一些评论。^[6]2005年3、4月间,重庆、广州、深圳、郑州、沈阳、成都、北京、上海、武汉、福州等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反日示威活动。2005年4月12日,正在印度进行正式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印度以及驻印国际主流媒体负责人的提问时也明确指出,日本当局应深刻反省,亚洲人民对其入常的强烈反响。^[7]4月21日,公安部就京沪等地发生涉日示威游行活动发表谈话,在充分肯定广大群众和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又禁止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活动,禁止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鼓动示威游行的信息。6月1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在参加“团结谋共识运动”组织的闭门会议后公开表示:中国将对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四国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投否决票。最终由于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日本“入常”计划被迫搁浅。

(三)反日“入常”事件中的民意作用分析

1.民意发挥杠杆作用,推动政府对日外交

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中国政府实际上与民众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积极融入当今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世界政治大国,基于自身国际形象以及稳定中日关系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种种考虑,不便于迅速而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此情况下,中国民众的网络签名和示威游行,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而且将中国政府的真正意图最直接、最有分量地展现了出来,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政府对日外交。

纵观整个反日“入常”事件,中国政府外交的层层推进可以说是与中国反日民意的表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在中国民众网络签名和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前,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清晰而坚定地表明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与中国民众的网络签名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相伴随,中国政府的表态也转变为直接和明确。例如,外交部刘建超的发言就是以民众网络签名为背景做出的。同样,温家宝总理在印度的谈话也与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有着时间上的连贯性和内容上的关联性。温总理的表述也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态度。及至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公开表示将对德、日、印、巴四国提案投否决票之时,中国政府在日本“入

常”问题上的态度则有了更为直接和明确的表达。可见,中国民意表达为政府的反日“入常”提供了理直气壮的理由和坚实有力的后盾,实际上成为中国政府对日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杠杆。

2.政府根据性处理民意,突显民意影响力的增强

民意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充当维护国家利益的杠杆,也可能对中外关系造成影响和冲击,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在反日“入常”事件中,民意成为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杠杆,所以政府给予反日民意表达一定程度的理解乃至支持。但是民意并非可以随意操控的工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积怨已久,民众反日情绪一旦点燃就会呈现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趋势,从而有可能冲击中日关系的底线,所以政府又要审慎对待,有效引导和限制。事实上,如前所述,4月21日公安部的谈话在充分肯定民众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对反日民意进行了限制和约束。4月19日至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统一部署的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天津、上海、广州、杭州、成都和北京等城市举行的报告会,帮助高校师生等了解国际形势、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中国的对日政策。^[8]同样,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也号召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理性爱国,努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局面,也要求民众回归理性,恢复日常秩序。纵观整个反日“入常”事件,政府在顺应民意与维护中日关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应对国内外变局的“双层博弈”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日本政府和民众回应中国民意,中日关系走向恶化

中国民意表达还对日本政府与民众产生了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被动的,而且其影响力也远不如对中国政府外交那么大。中国民众示威游行后,除日本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外,日本政界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既然中国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就得做出应对(缓和目前的局面)。”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一次演讲会上也表示:“破坏活动危害了一般(日本)民众,不论谁看了都会认为是中国不对。”^[9]此外,“日本外务省加强了对中国民意的研判,尤其是因特网上的涉日言论。一些重要的涉日文章,会很快翻译成日文送到外务省官员的案头,以供决策参考”^[10]。

中国民众示威游行经过日本媒体的歪曲报道还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很多日本电视台不尊重基本事实采取了刻意夸张的手法反复播放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企业受损的情况。有些媒体则

特意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傲慢、无礼和拒绝道歉,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政府是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发动者。这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报道,必然对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以及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005年5月14日和15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有高达九成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示威游行的措施表示“不理解”,有高达八成的被调查者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和赔偿。部分极端分子甚至采取野蛮行动,攻击、破坏了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领事馆等外交机构,中国驻日大使馆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招牌被日本极端分子淋上了红油漆,驻大阪的中国领事馆收到一封装有空弹的恐吓信,信中写道:“如果中国的反日示威继续,则将袭击中国留学生。”^[9]

4.西方媒体关注中国民意,日本“入常”面对巨大压力

中国民众反日示威游行引起了西方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反日示威游行进行了跟踪报道,这些报道在质疑中国政府默许示威游行的真实目的的同时,也肯定了学生示威游行动机的真实性,认为日本确实应该正视和反思历史。比如,法国《费加罗报》的社评文章说,中国学生以示威游行发出警告至少并没有错。二战结束已60年,日本始终没有能力承认历史错误。毫无疑问,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日本友人那里不被视为人的第一品德。但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迫使每一个国家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假如德国没有承担历史责任,我们难以想像欧洲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日本首相小泉每年执意参拜埋葬战犯的靖国神社,难道仅仅为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在政府不做任何努力教育下一代的前提下,提出上述问题完全是合理的。当日本一方面宣称要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一方面又背弃1947宪法,向伊拉克出兵,使其自卫队逐渐承担正规军使命之时,日本尤其需要紧急反思历史。^[11]由于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被称为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个权力机关”,因而欧洲媒体对中国反日示威游行的广泛报道势必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反响,过去西方民众对于德国屠杀犹太人、德国赔偿、德国道歉等史实耳熟能详,但对于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则知之甚少,现在经过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西方民众开始关注并思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现实动向。

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还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抗议行动相互支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声音,使得身为日本“入常”盟友的德国也对日本产生了不满。^[12]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一改支持日本“入常”的态度。

他强调指出,日本想要在联合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须首先取信于邻国,说服亚洲各国。所以日本政府应该与有关国家进行直接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13]由此,日本的“入常”外交逐步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总之,在反日“入常”事件中,中国民意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显性因素。从民意影响的对象来看,中国民意不但能对中国政府外交产生影响,而且还能对日本政府和民众,乃至其他西方国家,甚至联合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影响的程度来看,中国民意的影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民意对政府外交的配合和支持上,而且从政府对民意既顺应又引导的态度和举措本身,也突显出民意影响力的增强和提升。另外,尽管中国民意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还较为有限,而且对日本的影响更多的还较为消极和被动,但是中国民意表达毕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回应。从民意影响的结果来看,中国反日“入常”民意诉求与日本“入常”失败的结果相吻合。可以说,日本“入常”失败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中国民众的网络抗议和示威游行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这在2005年4月7日安南秘书长的发言中可见一斑。总体而言,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虽然主要还是通过作用于中国政府外交来实现的,但是作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强有力的影响势头已经开始显现,这意味着民意正在逐步从国际关系的幕后走向前台。

三、对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工作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顺利完成,因而,如何认识和评估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作用,如何促进和推动民意与中外关系的良性互动,如何构建和完善中国民意表达的多元机制,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尤为必要和迫切。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三点应该予以重视。

(一)重新审视中国民意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近些年,中国对公共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在逐步提高,但公共外交目前仍处于中国外交体系中的边缘化位置。究其原因,在于对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的忽视和低估。其实,不论从民意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还是从民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从民意的初衷和目的来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的百年耻辱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往往体现了民意对维护国家利益的追求,包含着对外交部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期待和厚望。所以,民意的初衷和目的永远是正确的、崇高的,应该给予民意充分的认可和尊重。

从民意的影响和作用来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元。中国国家利益的边界也正在突破传统的地理界限而向世界拓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民意正在经历着从草根到主流的崛起历程,民众的外交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升和增强。在此背景下,政府垄断外交事务的局面逐步被打破,民意频繁介入外交事务并展现出愈益多样化的外交作用和愈益强劲的影响力。

因此,从加强公共外交工作的角度来讲,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中国民意在中外关系演变中的战略价值和作用,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地支持民意独立和自主地成长和发展,允许其通过各种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对外极端言论也允许发声和表达,要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的民意表达不但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民意表达自身也不是一种声音在说话。中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是中国各种民间意志的综合,政府尊重民意,但并不代表民意只有一种。应该看到,多元与差异的民意表达才能更好地彰显自身的真实性和威慑力。

(二)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

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对于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民众对中国外交和国际事务相关信息的全面了解是民意与中外关系良性互动的基本前提,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和相关国际事务的理解和判断不够准确,这就使他们对中外关系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片面性,甚至是非理性,所以其言行有时就会对中外关系造成某些冲击和负面影响。为此,政府应将外事信息的提供与外交政策的阐释经常化、制度化,使民众明白政府是如何认识和判断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政府在重大外事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政府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那样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民意态度和倾向如何也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所以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向公共外交相关负责人咨询并了解民意所向:民众如何看待某个外交事件,什么政

策措施能得到民众认可和支持,如何能不招致民众的抵制和反对,等等,政策制定者应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

(三)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加强制度构建,打造多元且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是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必然要求。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民意表达最充分、最便捷的渠道是互联网,但正如互联网的优势有目共睹一样,它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在真实性、代表性、权威性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无疑是影响民意作用发挥的短板,而且民意表达对互联网过度依赖本身也恰恰说明了民意表达渠道的匮乏和不畅。

民意表达渠道的拓展需要在“畅通”和“多元”上动脑筋、下功夫。首先,加强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一方面,原有的传播媒体,尤其是面向海外的媒体在继续传播政府政策立场和主张的同时,可以增加时段、开辟专栏,最大限度地反馈民众对中外关系的态度和意见,让中国民众原始、多元的声音更直接、更真实地在海外传播。另一方面,逐步打造能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比肩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媒体。这些媒体可以由政府和民间合作创建,而且其传播的内容,更多的也可以来自民间。其次,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应鼓励人大代表将反映民众观点的谈话内容通过媒体及时传播出去,这应该成为人大代表的核心工作之一。再次,更好地发挥各级军官的作用。中国军事力量历来为西方国家所关注,中国军方的信息发布也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基于此,可以进一步放开各级军官的言论,让世界听到中国军人的声音。总之,鉴于民意之于外交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其战略意义与价值,从制度和机制上予以鼓励和引导,并深入拓展其表达渠道,进一步提高其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网. 民意的概念[EB/OL]. (2009-07-06)[2014-07-05]<http://www.my12340.cn/article.aspx?ID=782>.
- [2] HENNESSY B C.Public Opinion[M].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85:8.
- [3] 喻国明. 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9.
- [4] 吴顺长. 民意学[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7.
- [5] 熊志勇. 美国公众舆论与战争——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J].外交学院学报,2004(3):45-51.
- [6] 中国新闻网. 外交部: 网民签名是要求日本正视历史问题[EB/OL]. (2005-03-24) [2014-07-05]<http://news.sina.com.cn/c/2005-03-24/23305455750s.shtml>.
- [7] 中国新闻网. 温家宝: 亚洲人民反日入常示威应引起日本反省[EB/OL].(2005-03-24) [2014-07-05]<http://news.sina.com.cn/c/2005-04-12/16165629838s.shtml>.
- [8] 中国新闻网.外交官作中日关系报告会,合作双赢符合两国利益[EB/OL]. (2005-04-20)[2014-07-05]<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4-20/26/565222.shtml>.
- [9] 符祝慧. 中国反日,日本也反华[EB/OL].(2005-04-13) [2014-07-05]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1/sino_jp050413.html.
- [10] 美国中文网. 中国外交学会打“民意牌”[EB/OL]. (2010-11-09)[2014-07-05]<http://www.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articlepage=2>.
- [11] 爱玛. 欧洲媒体广泛关注中国反日示威[EB/OL]. (2005-04-22)[2014-07-05] <http://www.xys.org/forum/db/90/194.html>.
- [12] 阮宗泽. 透视联合国改革背后的大国角力[EB/OL]. (2005-07-05)[2014-07-05] <http://www.bjqx.org.cn/qxweb/n6218c67.aspx>.
- [13] 冯俊扬. 巴拒绝支持日“入常”, 安南呼吁日本先取信邻国[EB/OL].(2005-04-08) [2014-07-05]<http://news.sohu.com/20050408/n225096380.shtml>.

[责任编辑 冯立荣]